经济研究

编者按：2008 年 4 月 18 - 20 日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“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”学术研讨会，本栏目刊出的是此次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以及部分与会专家的论文。

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

吴承明

这个发言我没有准备，因为是电话通知的，我忘了题目，一直以为是讨论典志的初稿。前天拿到会议手册，我才知道是讨论一个大题目，叫“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”。这个题目太大了，因为我没有准备，所以我想谈点典故，因为我老了，过去有些老事还能回忆。我记得我们有个论坛，叫《中国经济史论坛》。这是 1993 年李根蟠先生首创的，年年开会，年年都论，十几年了。我还记得头一次论坛的题目是“清代农业的评价”，主题发言就是方行。后来又有四次叫“传统经济的再评价”，讨论了两年。这个传统经济就是指清代，再评价的意思是，因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，清代经济是停滞或者是走下坡路的。走下坡路的根据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，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高峰，过了高峰就走下坡路。高峰在唐宋，以后就是下坡路了，到清代就下到最后一坡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论坛就是为了扭转这个看法，经济在清代还是有所发展的。今天我们戴老、戴主任就是讲发展。方行教授和魏金玉教授也都讲发展。在 1993 年，我们头一次开会的时候，我就提出一个怪论，说我们这里一个 Pro-Qing School，讲清朝好的一个学派，以方行为首，李伯重、魏金玉、江太新都在内，那天开会的时候，好像只有吴慧反对，这时候国外还没有那个所谓“加州学派”。弗兰克的《白银资本》、彭慕兰的《大分流》还没有动笔写呢，王国斌的《转变的中国》写出来了，还没有发行。它的发行在咱们开始之后。只有一篇李中清关于清代的人口行为，他是做的口头报告。所以，这个 Pro-Qing School 实际上是中国学者首创的。在国际上还是停滞论，哈佛的中国研究中心是这个意见，那个胡佛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更不用说了，代表人物马若孟。这里我插一个故事：李中清在美国办了一个清史的杂志，Late Imperial China，中文叫做《清史问题》，有人投稿，翻译了一篇文章，是方行的文章。他们也采用匿名审稿制，匿名审查者就是马若孟，他回信说这个文章不宜发表。那时我刚好在美国，我给李中清说这个还是可发表的，后来就发表了。过了几年，2000 年，马若孟到中国来了，到南开，我跟他谈 Pro-Qing School 在美国很盛行，我就给他列举王国斌、弗兰克、彭慕兰

[**收稿日期**] 2008 - 5 - 10
[**作者简介**] 吴承明（1917—），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；北京 100836

等人，最后马若孟说“还有我”。这是六年的工夫，他转变了。讲清代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观点，到现在差不多有些共识了，当然，共识的内容还不一样，你像彭慕兰和弗兰克就有差别，他们两个还互相批评。最大的还是黄宗智的《悖论》，黄宗智的《悖论》是 1992 年在 Modern China 上发表的，同时他寄给我一个中文稿，想在中国发表。我给他找了一些地方，都不敢发表，《历史研究》不发表，我们的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也不敢发表，后来找到丁日初，他说，上海可以发表，上海比较开放。最后社科院《史学理论研究》发表了，先开了一个讨论会，把讨论会的批评意见也都写上，用匿名制，不指出姓名，用“有人说”。那个时候，我顾虑还是很大的，不像我们今天开会很透明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这个很好，这个也不容易。

我们这个会叫做宏观经济总体评价，这个非常好，要总体评价，就需宏观观察，Holistic Perspective，这是法国年鉴学派首创，可以说是布罗代尔首创。我们要讨论清代这个大题目，必须要总体评价。总体评价就是结构主义，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。布罗代尔说他的结构论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来的，马克思首先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结构，以后又提出几种结构。总体评价不仅要看各产业部门，第一产业，第二产业，第三产业，还要看上层建筑，还要看制度是否先进，看管理是否有效，政府是否有作为，看意识形态，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否正确，等等。

什么叫结构？结构就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。总体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和，基础有许多部分，上层建筑也有许多部分，每个部分与总体的关系都很好，都恰当、和谐，这个总体就很强大，行话叫作“总体大于部分之和”，这个大出的部分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。在计量学上，这个动力可以用 GDP 解释出来，所以我们会议明天要讨论麦迪森的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》。明天我恐怕不能参加会议，所以先说几句。

麦迪森 1997 年到北京，在科学会堂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，那天我作评论员。他重点是讲新中国的 GDP 和未来展望，但从汉代讲起，他说人均 GDP 在宋代发展很快，到元世祖时达 550 ~ 600 美元，历明、清无变化，直到嘉庆还是 550 ~ 600 美元。所以他是明清停滞论。那时他的书还没有正式出版，这是根据 OECD 的预印本。他的二版新书我今天才看到，翻了一下，只是将 550 ~ 600 改为 600 美元。还是明清停滞论。那天我没有评他的估计，因为我自己没个数，不能评别人的数，我只是说对明清的评价应包括制度因素，如财政货币化、一条鞭和摊丁入地、押租制和永佃权、雇工人身自由等。现代化的 GDP，即用国民账户（SNA）制度计算的 GDP，是可以用索洛（R. M. Solow）的余值法分析出经济增长的“全要素生产率”（代替过去常用的劳动生产率）。例如丹尼森（F. F. Denison）分析 1929—1982 年半个世纪美国的 GDP，年均增长率只有 2.92，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是 0.66，规模经济的贡献是 0.26，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贡献是 0.23。其他因素的作用是负 0.13。六项加起来是 2.92。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有的是负数，例如节能减排，负数越大越好。

其实所称“全要素”分析，并不全面，尤其上层建筑方面，许多要素是不能计量的。如“三个代表”就不能计量，它的伟大作用在“余值”中表现不出来。不要迷信计量学方法。尤其在清代，计量根本靠不住，麦迪森说他的 550 ~ 600 美元是 guestimated，即“瞎猜”出来的。我们要研究清代宏观趋势、总体评价，还得用历史学方法，一件一件地考察、论证。考察它发展的因素，也考察阻碍它发展的东西，我叫作“逆流”，像禁海、迁边、拒绝马戛尔尼，都是逆流。记得有一次讨论会上，我说清代社会经济，在物质文明、在生产和流通方面，确实有很大发展，但在制度和思想方面，显然落后。因为就清王朝所处的时代来看，在制度革新上应该有个跃进，应该有体制改革，而实际上连一部保障物权、债权的民法都没有出来，并且文字狱的逆流使 17 世纪的启蒙思潮偃旗息鼓，后继无人。今天我还是这个看法，请批判。

谢谢！